

论君子“乐德”的养成

杨 隽 张与弛

内容提要 周代礼乐文化致力于君子“乐德”的养成,通过不断加强对君子集团的“乐德”教化进而达成巩固政权的目的。仪式歌诗是永言的歌,是对“乐德”精神的艺术演绎,更是彰显“乐德”典范的乐语艺术;仪式合乐是“乐德”教化的重要实践形式,是周代统治集团传达礼乐精神、弘扬“乐德”理念的重要媒介,合乐艺术肩负着天下大治的政治使命。君子集团在升堂歌诗中、在钟鼓磬管的协奏中、在屈伸俯仰的合舞表演中领悟“乐德”的真谛与精髓。“乐德”养成不仅标志着君子政治化、社会化的程度,而且投射出他们艺术化、审美化乃至德化的人生进程,更是镌刻下早期人类“文而化之”的足迹。

关键词 乐德 君子 礼乐仪式 升歌 合舞

杨 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10097

张与弛,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210097

为了巩固王权,西周统治者在建国之初即“制礼作乐”^[1],建立礼乐制度,完善礼乐教育体系,以温文其恭的礼乐文化消弭武力征伐的野蛮和血腥。周代贵族阶层因得天独厚的政治地位而享有参加礼乐活动和接受礼乐艺术教育的特权。郭店简《性自命出》有云:“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2]《诗》《书》的结集以及礼乐制度的建立是有为者的文化成果,所谓“有为者”或是王权的执掌者、亦或是王权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是政治话语的缔造者、执行者、维护者,并因此掌握着文化的、艺术的绝对话语权。《左传·襄公九年》曾载晋国知武子云:“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3]又《礼记·乐记》云:“唯君子为能知乐。”^[4]可见由“有为者”“劳心者”构成的君子集团是贵族阶层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殷商礼典与甲骨卜辞书写形式研究”(18BZW110)、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研究成果。

[1][4]《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88页,第1528页。

[2]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

[3]《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43页。

中德高望重者的代表,是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是礼乐文化的直接受益者、维护者、继承者。他们自幼进入国学,习诗、明礼、知乐,尊称为“国子”,而成为君子则是他们的人生理想。郭店简《五行》谓:“君子集大成,能进之为君子。”^[1]为此,国子长期接受礼乐技艺训练,深受礼乐精神的濡染。《周礼·春官》有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2]大司乐严格遵循“成均”^[3]乐法掌理礼乐教育体系,任用德才兼备的教师,聚合邦国子弟,通过教习乐语、乐舞实行“乐德”教化。“乐语”的教习主要是传授《诗》的礼乐话语内涵,具体是指结合礼乐流程中的歌诗、赋诗、说诗环节讲授“兴”“道”中的“乐德”思想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国子讽诗、诵诗和言语说诗的艺术修养^[4]。乐舞的教学主要是训练国子《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七部舞蹈的表演技艺,这七部舞蹈分别是黄帝、尧、舜、禹、商汤、周武王六代的祭祀大舞,因此深刻领会六代大舞的“乐德”象征意义也是乐舞教学的重要部分。以“中和祗庸孝友”为思想内涵的“乐德”教化是“成均”国学的教育宗旨。君子集团浸润在乐语、乐舞的艺术氛围中致力于中正敦厚、谨敬庸和、纯孝友爱的政治品格的塑造,故郭店简《五行》云:“不乐亡德。”^[5]“乐德”的养成不仅是君子集团尊崇政治地位的标志,而且投射出他们艺术化、审美化、德化的人生进程,更是镌刻下早期人类“文而化之”的足迹。

一、礼乐精神:君子“乐德”养成的核心理念

郭店简《语丛二》云:“严生于礼。”^[6]严正、不容僭越的西周宗法政治秩序是在礼制的约束和规范中建构起来的,而促进这一秩序的建立必须通过“文而化之”的方式,即通过诵诗、习舞、知乐陶冶艺术情操,塑造贵族阶层成为温文有礼、睿智忠勇的君子,并不断激励他们建功、立言,成为治世栋梁。可见礼乐文化正是通过不断加强对君子集团的“乐德”教化进而达成巩固政权的目的。《礼记·乐记》云:“礼乐皆得,谓之有德。”^[7]礼与乐互为表里,相须为用,共同致力于君子“乐德”的养成,即礼与乐的教化宗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具体的实践方式不同。《乐记》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8]音乐以情动人,陶染心灵,易于通过唤起人的同情同理,在不同阶层之间建立情感纽带,在族群内部实现价值观与审美观的融通,礼教正是充分利用了“乐”的这一艺术特质针对国子群体展开“乐德”教化。因此“乐德”教化首先是诉诸礼的制约和规范,通过严格的礼制区别贵贱、尊卑,从而赋予王权绝对的尊崇。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乐”以情动人的特质,弥合、消解由辨等带来的嫌隙和怨愤,即“乐”是因为“礼”的需要而存在,君子长期接受的“乐德”教化实质上是以“礼”的精神为核心的政治教化,这意味着“乐德”的养成根本是政治品格的养成,即叔孙豹所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9]《礼记·乐记》亦云:“德成而上,艺成而下。”^[10]而且据《周礼》记载,“乐德”养成不仅需要循序渐进的礼乐技艺学习,而且还需要长期的艺术熏陶和思想教化,进而提升情感境界、锻造意志品格,具备建功、立言的远见卓识和胸怀气度。

[1][6]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第95页。

[2]《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87页。

[3]郑司农云:“均,调也。”见《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87页。

[4]参见笔者:《周代乐官与典乐诗教体系》,〔北京〕《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5]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7][8][10]《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28页,第1529页,第1538页。

[9]《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79页。

礼乐精神是周礼制度在理念上的显现,同时由于宗族、血缘是周代政治集团至为重要的联结纽带,因此礼乐精神又总是带着宗族亲情的底色,如郭店简《性自命出》云:“礼生于情”^[1],又云:“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人拨入之心也够。”^[2]礼、乐合一,以情动人,这决定了“乐德”教化与礼乐精神之间的内在统一,即针对国子群体的“乐德”教化不仅表现在对外显的行为的制约,更体现为对情感表达方式与精神内涵的引导、规范,而且这一特征突出地体现在五礼制度中。据《周礼》记载,大宗伯统掌吉、凶、宾、军、嘉五礼:“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3]吉礼包括祀天神、地祇和祭人鬼的仪式,其中人鬼祭礼的体系尤为完备,仪式繁缛,共有六礼,也称六享,整体分为三级式,依次是太祖庙合祭、馈食先王的禘礼和春夏秋冬四季的小祭。在上述祭祀人鬼的礼乐活动中,礼乐精神、“乐德”思想理念是建立在孝道、友爱的亲情基础上传达的,即通过确认孝子在宗族内部的宗子地位进而确立其在政治集团内部的核心地位。吉礼以孝道亲情为基础,为周王营造了向君子集团昭示中正敦厚的精神理念的绝佳机会,这是“乐德”教化的重中之重。此外,凶礼是友邦盟国之间救患分灾的互助制度,友邦中的任何邦国遭遇亲人死亡、疫病饥馑、水火之灾以及面临围败、寇仇等危难时,其他邦国不仅要致意慰问,而且通常会提供实际的经济上的救助或是军事支援,可见在政治舞台上演的不仅是利益的争夺和政治角逐,邦国间还流动着温暖的同情与敦厚的友谊。不仅如此,为了亲附邦国,增进邦国友谊,周王经常举行宾礼,如《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覲曰视。”^[4]宾礼分为八类,是配合朝聘制度而举行的礼乐活动。按照宾礼规定,东、南、西、北四方诸侯严格遵循春、夏、秋、冬时节分别朝觐周王,称为朝春、宗夏、觐秋、遇冬四种礼乐仪式,此外还有随时会见聘问的礼仪以及四方诸侯同来朝见周王的仪式。总体而言,仪式繁复、密集举行的宾礼反映了周王一方面力图通过这一制度向四方诸侯宣示统御权力,另一方面是借此考察诸侯的诚敬之心和政治功绩,这无疑是重要的“乐德”教化。相比于吉礼的整肃庄严、宾礼的隆重盛大,嘉礼更为平易,目的在于亲和万民。嘉礼包括饮食礼、婚冠礼、宾射礼、飨燕礼、脤膾礼、贺庆礼六种,这六礼更专注于沟通情感,并且各有侧重。饮食礼通过宴饮方式为宗族兄弟创造和乐融洽的交流情境,最为常见的就是燕礼仪式和乡饮酒礼仪式,如《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膾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5]兄弟友爱、夫妇和美、主宾和乐、友邦亲和、邻国友好,无论宗族、室家之内,还是社会交往、政治外交,和合敦厚的情感氛围笼罩在各种礼乐场合中。足见周代统治者一面通过完善礼制,在室家、宗族、邦国分别设定严格的规矩,严格维护政治秩序、伦理秩序,维护王权的中正地位,彰显中正、祇敬的“乐德”理念;一面利用祭祀、聘问、宴饮、乐射、婚冠等礼乐活动放大情感的力量,用敬重、孝顺、相亲、友爱弥合由“礼”造成的差距、隔膜,疏解怨怼,平抑怨愤,故郭店简《语丛一》有云:“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者也。”^[6]礼乐精神依赖宗法亲情而发挥节制和感化的政治功能,这正是“乐德”教化的目标。

“乐德”精神内涵是以礼乐象征的方式显现的,这是“乐德”教化得以实施的关键。例如,周代祭礼隆重而庄严,着力营造人神、人鬼沟通的叙事情境。虽然神鬼是祭礼的敬奉对象,但叙事视点显然不是以神鬼为中心,“孝子”反而是祭礼仪式的中心人物。《礼记·祭义》云:“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

[1][2][6]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第106页,第159页。

[3][4][5]《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57-761页,第757-761页,第757-761页。

敬以讫；其进之也，敬以愉；其荐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将受命；已撤而退，敬斋之色，不绝于面。……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1]“孝子”在祭祖流程中的仪容示范无疑以敬祖为核心，具体为站立讫姿，进位愉色，荐时满怀期待，退立承听父母面命，仪式结束时仍要庄重敬仰，何时弯腰、何时欢愉、何时期待、何时保持庄敬，全在仪式掌控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孝子对先祖的情感表达是流于形式化的虚伪表演，因为“孝子”对先祖的“深爱”是严格有序的礼仪容止的出发点，深爱-和气-愉色-婉容无疑是孝子在仪式中所遵循的由内而外的情感表达路径，抽象不可自现的深爱之情通过“气”“色”“容”等仪容形象得以具体呈现。“孝子”基于深厚情感而塑造的仪式化形象既真实动人又肃雍庄敬，在这种静穆深沉的情感语境中，参礼者与“孝子”的共通感不断被唤起，而且随着内在共通感的升华，“孝子”形象的礼仪示范意义也随之达成。显而易见的是，祭祀仪式并不是尽情随性宣泄悲哀的无序空间，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仪式流程，“孝子”在虚拟的人鬼沟通的空间按照既定流程向参礼者示范“孝敬”的仪容行止。“孝敬”主题通过“孝子”仪容形象而申明深化，深爱-和气-愉色-婉容的情感显现方式通过“立象以尽意”的艺术路径在礼乐仪式中履行着话语功能，阐发忠诚孝敬的思想理念，这无疑是一场深刻的“乐德”教化仪式。

“乐”也以象征的方式强调“乐德”思想理念，如《礼记·礼器》曰：“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2]所谓“称”正是“礼”的灵魂，是强调“乐”的规格与政治地位的对等、匹配。如《周礼·春官·小胥》记载：“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3]在周代，钟鼓磬乐器多悬挂演奏，故称“乐悬”。周王、诸侯、卿大夫、士按照政治等级分别享有不同的乐悬规格，因此乐器也是重要的礼器。周王享用的乐器规格是乐悬四面，象征拥领天下四方的权力、地位，这是王权中正地位的标志；诸侯享用乐悬三面，去南面的乐悬，象征尊让周王的至崇地位；依例，卿大夫再去北面乐悬，享东、西两面乐悬；士仅享用东面乐悬。乐器规格成为政治地位的象征，用以区别贵贱、尊卑。一方面周王的中正地位得到凸显，一方面提示百官尊卑有序、进退有礼，因此乐器即礼器，是以“乐”的仪式表演传达“礼”的精神。《礼记·乐记》曾谓：“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4]王权集团正是通过礼乐教化平抑怨怼，防止僭越发生，日易滋生敦厚和敬之心，由内而外，实现“乐德”的养成。

周代礼乐活动形式多样，吉礼、飨礼、射礼、冠礼等仪式隆盛端肃，规程冗长繁复、严正有序，参礼者的站位、移位、俯仰、疾徐等动作都有既定的设计与节度，不允许有丝毫错谬。《礼记·冠义》云：“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5]礼乐流程对君子的规范是严格而具体入微的，面容、表情、体态、辞令，无一不在“礼”的制约下，这是因为端庄恭敬的仪表和从容和顺的辞令交接是君臣有位、父子有亲、长幼有序的礼仪秩序的体现。行为的制约固然重要，但“礼”的意义显然不仅限于对具体言行的规范，而在于精神感召的力量。对此，李泽厚说道：“具有‘神圣’性能的‘礼’在主宰、规范、制约人的行为、动作、言语、仪容等人的各种身体活动和外在方面的同时，便对人的内在心理（情感、理解、想像、意念）起着巨大作用。”^[6]礼是对具体的言行举止的制约、规范，但这呈现于外的身体活动显然并不是“礼”的根本之义，对情感、意念的控制、平衡才是“礼”的深刻性。“礼”约束心灵，使欲望不被过分压抑、也不至于放纵；“乐”则以平和的情感基调化解对立、矛盾的情绪，消解怨愤，从而持续保持祇敬雍和、温厚仁爱的精神气质，并常态化为稳定的人格操守，唯此才可谓真君子。因此，以“中和祇庸孝友”为思想内涵的“乐德”教化不仅是艺术

[1][2][4][5]《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94页，第1434页，第1530页，第1679页。

[3]《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95页。

[6]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9页。

品格的修养,也是熔铸礼乐核心精神的政治品格塑造。

二、礼仪升歌:彰显“乐德”典范的乐语艺术

周代礼乐教化以“歌奏舞”交融的艺术形式展现、演绎“乐德”精神,这一方面决定了君子“乐德”的养成对升歌、乐奏、舞蹈艺术形式的依赖;另一方面意味着“歌奏舞”统合的艺术形式必须以“乐德”理念为精神纲领,唯此才能将国子培养为中正敦厚、祇敬雍和、纯孝友善的“君子”。《礼记·乐记》云:“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1]升歌是“乐德”教化的重要乐语,《尚书》有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2]歌者登台,歌声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精湛的升歌表演深情动人。《乐记》曰:“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3]歌诗是“永言”的歌,在表意方面显然优于乐奏和舞蹈,因此升歌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乐德”教化使命。升歌缘情而发,言说心志,感人深,化人速,是移风易俗的重要艺术形式,因此先王制定礼乐制度,倡导“乐德”教化,构建国学体系,专门对国子群体进行乐语教育。这决定了《诗》与“乐德”精神的密切对应性。换言之,《诗》是凝聚着“乐德”精神内涵的重要乐语,歌诗“升堂而歌”的艺术表演形式也能够客观证明其对“乐德”教化的重要意义。

上博简《孔子诗论》有云:“诗亡隐志”^[4]。升歌言志,既是抒怀,也是对“乐德”精神的艺术演绎,更是彰显“乐德”典范的乐语艺术。西周政治集团为了巩固王权不遗余力向天下四方宣示王权的力量,积极展开“乐德”教化活动,将周部族成长的艰难历程、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王者的威仪与优秀政治品格都作为歌诗艺术言说的主题。《礼记》有云:“祖述尧舜,宪章文武。”^[5]为了彰显“乐德”精神,尧舜禅让、文王盛德、武王忠勇、周公敦厚同样是歌诗艺术着力渲染的重心。文王是引领周部族走向兴盛的英雄先祖,文王为周族子孙开创基业的历史功勋以及与大商在经年斗争中显示出的英武气概、伟岸人格,成为后世执政者效仿、参照的范式。因此只需稍加翻检《诗》的篇目就不难发现,文王是升歌中最为经典的艺术形象。如《周颂·清庙》曰:“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6]《清庙》为祭祀文王而作,清庙是祭祀文王的庙宇,开篇“於穆”二字赞叹清庙的庄严肃穆,象征文王之德纯厚清明、仁爱安静,此时秉承文王美德的君臣庄肃雍和、温文其恭、济济一堂。此外,《维天之命》《维清》两篇也是对文王盛德的赞美歌颂。《维天之命》有云:“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7]《维清》有云:“维清辑熙,文王之典。”^[8]赞颂文王顺应天地的要求,建立清明的政治体系,时刻保持宽厚、中正、仁爱的王者气度。另《大盂鼎》亦云:“今我佳即并稟于文王正德。”^[9]结合《周颂》和青铜铭文不难发现,在诸侯咸集、百官俱至的特殊时刻,周王不仅作为主祭向文王表达赞美与诚敬,而且向先祖神灵、向诸侯、向百官显示其既是恭敬仁孝的孝子,又是温厚友爱的父亲、兄长,由此凸显其中正敦厚、恭谨宽和、孝顺友爱的君子风范。这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普遍具有的政治逻辑。因此,《清庙》《维天之命》《维清》三曲歌诗表演实质上是通过文王盛德的赞颂不断确认王德正位,达到稳固江山社稷的目的。《礼记·仲尼燕居》云:“升歌《清庙》,示德也。”^[10]君王举行祭祀礼、大飨礼等礼乐活动时都要演奏《清庙》之曲、歌《清庙》之诗,歌诗《清庙》成为文王盛德的象征性演绎,故谓之“示德”,意谓歌诗即“乐德”精神的艺术演绎,是传达“乐德”精神的重要乐语。郭店简《五行》云:“乐则有德,有德则邦家兴。文王之示也

[1][3][5][10]《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45页,第1634页,第1614页。

[2]《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

[4]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6][7][8]《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83页,第584页,第574页。

[9]王辉:《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如此。”^[1]马王堆帛书《五行》谓：“‘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此之谓也。言大德备成矣。”^[2]“文王”在歌诗唱诵中化为经典的“君子”形象，为后世仰望、膜拜，对国子而言，这是激励，也是鞭策。

不仅王者的“盛德”在融情言志的升歌艺术中焕发出非凡的生命力，部族英雄带领宗族生长、壮大的历史时刻也定格为永恒的民族记忆。清华简《耆夜》记载了武王戡黎凯旋之后在文王太室举行的饮至礼，歌诗与宴饮交错展开，在歌声与觥酬之间达成了犒劳鼓舞、安抚慰问、和同团结的政治目的。武王首先以主人身份歌《乐乐旨酒》，诗有云：“乐乐旨酒，宴以二公；恁仁兄弟，庶民和同。方臧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3]透过诗句能够感受到武王对毕公、周公的赞赏，并寄予兄弟恭、团结和谐的期望。武王认为兄弟之间、宗族内部的和同团结与将士的忠诚勇武是征战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歌诗中辉映着武王中正和合、敦厚友爱的人格力量。接着武王酬周公，作歌一终曰《輶乘》，然后周公以主宾身份连续升歌三首，分别为《鬲鬲》《明明上帝》《蟋蟀》，其中《蟋蟀》有云：“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4]这是周公在劝诫得胜还朝、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君王以及全体将士切莫享乐无终，勉励同僚居安思危、勤勉戒惧。诗中内蕴的忧患意识体现了西周统治者摆脱天命制约的自信与勇气，同时显现了他们历经长期的政治实践、礼乐陶染而成的中正庄肃而温文有礼的君子风范。伴随升歌艺术表演，文王、武王、周公等部族领袖中正勇武、敦厚雍和、孝敬友爱的精神品质深深触动参礼者的心灵，“君子”风范不断投射进参礼者的精神世界。在礼乐仪式中，歌诗成为塑造“乐德”典范的艺术表演。

有周一代，以升歌诠释“乐德”理念的乐语艺术在礼乐仪式中普遍存在。君王除了举行庄严、隆盛的祭礼、大飨礼，还经常举行燕礼，设宴款待、慰劳诸侯、群臣。燕礼期间，除了美酒佳肴，同样加入升歌表演。据《仪礼》载，燕礼的歌诗表演由正歌、无算乐构成，正乐部分的升歌表演主要以工歌、笙奏、间歌、歌乡乐四种艺术形式有序展开，其中升歌表演曲目共12篇，共同营造和乐、融洽的宴饮气氛。以工歌为例，乐工登台歌《小雅》之《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其中《鹿鸣》诗云：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佻，君子是则是傲。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5]

为表示对嘉宾的盛情，主人不仅备齐美酒佳肴，而且鼓瑟鼓琴、吹笙鼓簧，营造和乐欢歌的愉悦氛围，君臣、宾主在萦回的德音中感受和合温情，君王敦厚宽和、中正雍容的君子气度在歌声中飞扬。季札曾赞曰：“美哉！”^[6]想必那一刻季札的心灵被《小雅》照亮了吧！祭祀、燕飨、乐射等礼乐活动是贵族生活的重要内容，升歌表演遍布于祭祀礼、飨燕礼、射礼、乡礼等礼乐仪式流程，琴瑟升歌萦回在庙堂、在乡里。由此可见，针对国子群体实施的以“中和祗庸孝友”为精神内涵的“乐德”教化并没有局限于概念化的表述，而是具象为“言志”的升歌艺术。升歌悠扬，八音俱备，国子群体在“乐德”精神的感召

[1]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2]裘锡圭：《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4—85页。

[3][4]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楚竹简》（一），〔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50页，第150页。

[5]《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5—406页。

[6]《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07页。

下将成德有为、经天纬地、立言不朽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

三、礼仪合乐：高扬“乐德”精神的宏大乐章

为了实现长治久安，西周统治集团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一改军事斗争中的强悍、威武，转而以礼乐文化取代武力征伐，建立国学机构，针对贵族阶层中的国子群体进行严格的“乐德”教化，积极营造文而有礼、和敬同爱的礼乐文明盛世。《礼记·乐记》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1]“礼乐相成，内外兼顾，礼仪敬和而无怨，温文有礼而不争，这表明“乐”的力量在于感动心灵，在于发人深思，在于美情移性。郭店简《性自命出》云：“教所以生德於中者也。”^[2]礼乐仪式流程是歌、奏、舞统合的综合艺术表演，谓之“合乐”，如郑玄注云：“合乐，谓歌乐众声俱作。”^[3]合乐表演是“乐德”教化的重要实践形式，“乐则有德，有德则邦家兴”^[4]，合乐艺术肩负着天下大治的政治使命。

合乐表演是群体参与的盛大艺术活动，这需要完备的礼乐制度保障。有周一代，针对“国子”的“乐德”教化是制度化、专门化的。据《周礼》记载，周代乐官数量庞大。据杨荫浏统计，仅乐官就有1463人，其中并不包括“众寡无数”的乐工，而且工作状态严正有序，保证了礼乐活动的专业、规范。这是乐教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为实施“乐德”教化创造了完备的条件。在礼乐仪式中，乐器既用于为歌诗、舞蹈配乐，也独立演奏。需要使用的乐器数量众多，不乏体积巨大的乐器，因此乐器的演奏和管理责任重大，乐官体系设置了专职乐官负责对乐器规格、陈列、乐音进行严格管理、调试。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发掘出土了钟、磬、鼓、瑟、琴、均钟、笙、排箫、篪等乐器，仅钟类乐器就有六十五件，分为上、中、下三层八组悬挂在筓虞之上，秩序井然，包括镛钟一件，甬钟四十五件，钮钟十九件，还有磬三十二枚，钟架两面，磬架一面，是典型的诸侯享用的三面“轩悬”规格，唯缺南面，象征尊让周王。乐器数量与体积更为巨大，乐官的工作量很大。并且每有礼乐活动，必先宿悬，就是在礼乐活动举行的前一天先悬挂乐器备用，典庸器专门负责设置悬挂乐器的筓虞，如《周礼·春官》载：“典庸器……及祭祀，帅其属而设筓虞……飨食、宾射亦如之。”^[5]典庸器属下包括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他们必须在活动前一日协作完成陈设筓虞的工作，至于悬挂乐器主要由大师掌管，但是大师是瞽者，因此具体由眡瞭来做。《周礼》载：“眡瞭……掌大师之县。”^[6]“县”即“悬”。由于乐器数量众多、体积厚重庞大，协助眡瞭的人员共有三百余人，工作人数明显与悬挂乐器的工作量成正比。《周礼·春官》载：“大司乐……凡乐事，大祭祀，宿县，遂以声展之……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7]意为大司乐要在宿悬工作完成后通过“展声”逐一检查乐音是否达到仪式演奏的标准，目的在于禁止淫声、过声、凶声、慢声，追求中正和美的乐音。不仅每一件乐器的乐音要达到标准，庞大的乐器群体必须按照音律的阴阳组合有序演奏，才能达到“极和”与“极顺”的“乐德”之音。专业、规范、完备的乐官体系不仅保证了合乐表演的艺术水准，而且为“乐德”教化提供了明确的思想纲领——“中和祗庸孝友”。

《礼记·学记》谓：“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8]对君子而言，礼乐艺术修养和“乐德”精神的熏陶是时刻相伴相随的，无论是沉思、学习之时，抑或在休息、赏游之时，“乐德”教化是融入君

[1][8]《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29页，第1522页。

[2][4]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第79页。

[3]《仪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86页。

[5][6][7]《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02页，第797页，第790-791页。

子生命进程的精神陶染,需要循序渐进、不间断的陶冶过程,故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周礼》也曾这样记载大胥的职责:“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春,入学,舍采合舞。秋,颁学合声。”^[2]春季学习合舞、秋季练习合声,春秋代序,一年四季,国子们在合声、合舞的合乐艺术氛围中陶冶情操,不断提升艺术品位与人格境界。此外,国子们还需经常参加礼乐活动,在盛大的合乐表演中体验“乐德”精神的感召。吉礼艺术流程就由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组成的协同表演,主要包括祭祀天神、地祇、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六种合乐仪式。而且,由于是最高规格的合乐表演,仪式场面端肃庄严,歌诗中正平和,大舞雄浑恢弘,加之金声玉振、琴瑟和鸣,八音克谐,众声融汇,故谓之“大合乐”^[3]。例如,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曲调的升歌表演,分别配合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乐调的演奏,加之《云门》《咸池》《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六代大舞,大合乐的表演流程成为礼乐盛典的艺术表现中心。具体而言,《礼记·乐记》记载的《大武》舞就是按照“六成”结构展开的大合乐表演,故称“合舞”,具体记载如下:

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4]

郑注云:“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始奏,象观兵盟津时也。再奏,象克殷时也。三奏,象克殷有余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蛮之国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职而治也。六奏,象兵还振旅也。”^[5]显然六种《大武》曲是与《大武》舞协同表演的。《大武》舞第一成为“始而北出”是对武王发兵场景的艺术呈现;第二成是“灭商”,是牧野之战的高潮;第三成“而南”、第四成“南国是疆”是呈现乘胜追击、平定荆蛮的历史性胜利;第五成“周公左,召公右”是模拟式复现战后周公、召公辅佐武王的政治分职布局;第六成舞蹈再现得胜还兵的场面。《大武》舞遵循真实发生的政治事件设计舞曲与舞蹈,模拟化、艺术化呈现战争的重要场景,这无疑是为了将武王伐商的政治功绩与中和敦厚的精神人格作为彰显、高扬的重心。正如《周颂·桓》云:“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6]歌诗对武王协和人心、平定四方、功成天下的伟大历史功绩极尽赞美,可谓与合舞表演相得益彰。再如,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完整呈现周公与成王所作的十首合乐曲目就是与琴舞协同表演的歌诗,成王、周公以及百官为祭祀先祖举行祭祀礼,诸侯来朝、百官集结,钟鼓磬管俱备,八音协奏,琴舞与歌诗相和。钟鼓喤喤,磬管锵锵,琴舞相应,在回环平和的吉礼合乐中,祇敬中和、友爱孝悌的“乐德”精神不断得到高扬。先是周公歌诗一首(仅留存以下四句):“无悔享君,罔坠其孝,享惟愆币,孝惟型币”^[7],感召百官孝敬先祖、忠心辅佐成王,这是对“祇敬忠孝”精神的高扬,显现了周公敦厚忠直的政治家风范,也显现了其作为长者的宽厚慈爱。之后,成王的九首傲感诗主要围绕礼敬天地、忠孝庸和的政治理念展开。如其云:“天多降德,滂滂在下。”^[8]又云:“遘我夙夜不逸,傲之,日就月将,教其光明。”^[9]显然,成王敬天不仅是祈求福佑,而且是对自己以及群臣发出的警示,勉励群臣居安思危。这说明统治集团已经充分认识到王权的稳固根本取决于自身及其政治集团整体品格素养的提升,他们不再幻想天命会赐予神力,而是以夙夜勤政、自省审慎、和合团结迎接上天的监督。一场

[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4页。

[2][3]《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94页,第788页。

[4][5]《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42页,第1542页。

[6]《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4页。

[7][8][9]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33页,第133页,第133页。

歌、乐、舞融汇的合乐艺术表演闪烁着、辉映着周公与成王敦厚庸和的人文情怀以及空前的自主意识,他们积极地以“乐德”精神取代武力角逐,不断展开自警自省的“乐德”教化活动,这既是政治自觉的表征,也印证了人文精神的成长。蔡先金在《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与乐章》^[1]一文中不仅结合《周公之琴舞》歌诗曲目中“启”和“乱”的结构特征详细分析了合乐表演的艺术形态,而且结合乐制、乐理、乐章、乐语、乐律、乐器、乐容的系统考察充分证实中国上古音乐发展已经相当成熟。这不仅有力地印证了周代合乐艺术的成熟,而且折射出“乐德”教化的完备。《礼记·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悖,恭敬而温文。”^[2]礼是制度、是制约,礼仪提供具体规范,约束举止进退,强调身份差异。诗、乐、舞构成的合乐艺术以情动人,感人心灵,贵族阶层观诗、观乐、观舞,耳濡目染,往还吐纳,全面培养彬彬威仪,实现“乐德”的养成,故“君子曰:礼乐不可须臾去身”^[3]。

《礼记·乐记》云:“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4]无论在朝堂、宗族,抑或是在乡党,君臣、父子、兄弟沐浴在潺湲婉转的德音中,欢歌笑语间完成了和敬、和亲、和顺的“乐德”教化,此谓:“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5]在“礼”的滋养下,在“乐”的陶染中,由外而内、循序渐进,君子精神世界的和顺丰实外化为文雅英华的神采、气度。

“礼乐文化一方面通过一系列仪式规定,保持政治生活稳定有序的运行,另一方面通过仪容、言行、道德、知识、修养的陶冶浸染,塑造出一个支撑起整个社会骨架的君子集团。”^[6]君子们在钟鼓馨管的乐奏声中,在屈伸俯仰的舞蹈表演中,在“壹倡而三叹”^[7]的歌诗艺术中,领悟“乐德”的真谛与精髓。《礼记·乐记》有云:“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君子听磬声则思封疆之臣。……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意之臣。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在礼乐德音中,君子听出的不仅是铿锵的、惶惶的音声,而是武臣的果敢勇武、封疆之臣的持守忠诚、志义之臣的浩然风骨、畜聚之臣的宽和仁爱、将帅之臣的中正雍和,正是他们构成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君子集团。他们擅长出使专对,能够从容化解政治危机。他们是运筹帷幄、叱咤风云、雍和有度、文而有礼的王者和家国栋梁。不仅如此,他们还是当之无愧的文化精英。他们歌诗唱酬、知礼知乐、含英咀华、哲思灵动,是文采斐然的歌者、诗人、智者、圣人。为了实现“乐德”的养成,为了达到“集大成”于一身的境界,他们的人生注定是不断自我超越的历程,因此君子的精神价值远远超越了其原本的阶层意义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绵广远。后代文化阶层无不受君子精神的影响。这意味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文化进程中始终不曾缺少君子的行迹,他们始终在路上!

[责任编辑:平 啸]

[1]蔡先金:《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与乐章》,〔兰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3][4][5][7]《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6页,第1543页,第1545页,第1536页,第1528页。

[6]傅道彬:《中国文学的君子形象与“君子曰”的思想话语》,〔北京〕《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